

苏区时期，党校的课程主要由两部分人员来讲授：一是党校领导和专职教员。如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包括任弼时、张闻天、杨尚昆、董必武、徐特立、罗明、李维汉、冯雪峰、成仿吾、李伯钊等人都承担了讲课任务。当然，这一时期专职教员极少。二是受邀邀请的其他部门领导。如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就邀请了毛泽东、陈云以及顾作霖等人来讲课。在省级党校，也借鉴了这一做法。像闽浙赣省委共产主义学校，即邀请了方志敏、万永诚、关英等人来讲课。就苏区时期而言，党校的讲课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坚持政治性和学理性统一

开办党校的目的，在于让党员干部更好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党的路线和党的基本知识，从而进一步坚定对共产主义理想的信念。安源老工人易友德后来回忆，安源党校开办期间曾有一门课叫《社会进化》，“讲课内容是从历史讲起：（1）野蛮时代；（2）渔猎时代；（3）畜牧时代；（4）农业时代；（5）工业时代。在讲各个时代分别讲政治、生活、组织、生产情况，并结合实际情况讲。”这个回忆虽很简单，但从讲课的内在逻辑看，明显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发展理论，落脚点在于阐述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这样，就将学理性与政治性有机地统一起来了。

到了苏区时期，这一原则得到了进一步发扬。如董必武为学员讲授《社会发展史》时，从“猴子变人”一直讲到“人类社会最终必然实现共产主义”。在这一过程中，他还结合中国的实际和个人的体会，“讲中国社会的发展、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压迫，农民起义，辛亥革命，五四运动”。这个讲课，则运用了马克思主义

苏区时期党校的课怎么讲

□ 杨会清

社会形态发展理论、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理论，同时密切结合中国实际，从而讲清楚了为什么要革命、怎样革命等现实问题。还有一堂课是《社会科学》，由杨尚昆讲授。学员肖锋回忆，“班主任（即杨尚昆）给我们讲社会科学，……还问大家有没有神鬼？同志们七嘴八舌讲不出道理来。班主任讲，我们党是信马列主义的，世界上没有鬼神。鬼神是从古代奴隶主、封建地主阶级到今天资产阶级反动派欺骗人民、奴役人民的精神武器，穷人求神拜佛仍然受穷，只有打倒土豪劣绅才能翻身解放。老师把这些道理一摆，我们都口服心服。”在这里，杨尚昆同样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并以此来阐述苏区为什么开展土地革命和反“神权”斗争的原因。

实际上，党校传授的不是一般知识，而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培养的也不是一般能力，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苏区时期的党校看，课堂上的讲授并不是单纯的政治说教或政治宣传，而是用真理、逻辑、规律去深化党员干部对革命的信仰、信念、信心，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学员谭启龙回忆，“这次党校的学习时间虽然不长，我的收获却是巨大的，……在此之前，我是抱着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向往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朱毛红军，为向土豪劣绅和挨户团报仇，为翻身求解放才投身革命

的。通过学习，倾听中央领导同志讲课，自己的思想产生了一个新的飞跃，明白了革命的目的是为天下劳苦大众求解放，是为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是为实现无限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从而使自己真正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坚信共产主义一定会在中国取得最后胜利”。可见，苏区时期党校在理论教育方面是非常成功的。

坚持理论性与实践性统一

苏区时期，到党校讲课的同志大多是既有丰富理论，又有实践经验的领导。在授课过程中，他们往往能用贴近现实、贴近生活或生动具体的典型事例来说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与价值性，因而真正做到了释疑解惑和价值引导。如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毛泽东曾给学员讲授《中国苏维埃革命史》。在讲这个课时，他首先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讲起，同时紧紧围绕当时农村革命这一实际，来阐述“我们的国情与别国不同，革命道理也就不完全相同”的道理。因为他所讲的课是学员最关心的革命理论问题和革命实际问题，加上“他的讲课既有马列主义理论，又有中国革命实际”，所以学员普遍反映：“听毛主席讲的课，通俗易懂，摆事实讲道理，越听心里越亮堂。”陈云在给学员讲《职工运动

史》时，同样能结合当时中国革命实际。他在讲五卅惨案的时候，就曾以大量的实例来描述当时工人的勇敢和不怕死，并以此来阐述“工人阶级是最革命的阶级，是产生共产党的阶级力量”。在分析五卅运动为什么会失败时，则从中国国情出发，强调“工人阶级必须联合农民做同盟军，革命才能胜利”。这样的讲授，很容易唤起学员毕业之后要深入农村、深入做群众工作的自觉。在闽浙赣省委共产主义学校，方志敏的讲课同样令学员难以忘怀。学员饶玉鸾回忆，“我于1932年5月参加了省共产主义学校学习。学习期间，方志敏同志每隔一星期就要亲自上一次课，他的讲课通俗易懂，又慢、声音又大，使我们接收快，收获大”。为什么方志敏的课如此受欢迎？就是因为他的课能够将理论与实际统一起来，从而真正做到释疑解惑。

值得注意的是，苏区时期党校还非常重视实践教学，把党校的小课堂与社会的大课堂结合起来。除上课外，学员还必须“参加社会活动和到附近的村庄去做群众工作”。学员李坚真回忆，“我到党校的第三天，就被派到附近的村子里和当地党支部建立了联系。董老（即董必武）十分注意做好群众工作，他要求我们帮助周围的群众挑水、砍柴、施肥、浇菜，每到星期六和星期天，我们就去帮群众劳动”。而学员李宽和的回忆，也证明了这一点。他回忆说：“学员到党校报到

之后，全体师生由校部分班编组到长汀、瑞金等乡村去搞扩红（即扩大红军队伍）和归队运动。在学习期间，也是一面集中学习，一面深入乡村开展宣传工作。”当然，还包括学员到粤赣省实习，他们在区委的统一领导下，分别到独立营、政府机关、群众团体和群众家里，进一步了解情况，深入开展实地调研。上述实践，有利于学员实现“向老师、同学和校外广大工农群众学习到阶级斗争知识”的目的。实际上，这同样是理论性与实践性统一的另一种教学形式。

坚持传授性与启发性统一

理论传授不等于填鸭式教育。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是要靠死记硬背，而是要创造性地学，要融会贯通，特别是要运用理论讲授、问题研讨、调查研究、自学等方式来激发学员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苏区时期，各级党校就是这样做的。如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就鼓励学员到调查研究中去思考理论和现实问题。1933年7月，第一期高级训练班学员到会昌县招抚区调研。在那里，学员们发现了一个问题，即“受敌人破坏和天灾影响，群众生活很困难，田岸、河口、新溪三个村庄有35%缺粮户。早稻被敌人抢光，晚稻未熟，人民挨饿，积极性得不到充分

发挥”。为此，他们联名向会昌县县委写了报告，同时将情况以书信方式向该班党支部书记汇报。最终，调研小组的报告和建议得到了董必武和会昌县委书记的重视，也使学员们进一步明确了党的宗旨和思想。与此同时，党校还鼓励学员之间开展研讨交流，同时注意引导学员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当时，上午和下午分别是听课和讨论时间。听课的时候大家都认真记笔记，不懂就问，讨论的时候积极参与。通过讨论，最后达到了互帮互学、解决问题的目的，从而提高了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如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成仿吾讲完《辩证唯物主义》之后，学员们“讨论起来很热烈”。有的学员问：“我们吃的饭、穿的衣服都是物质，为什么还要讲主义？”总之，“大家学习热情很高，整天争论什么是辩证法”，甚至“晚上睡觉还争论不休，查哨的来通知熄灯，还在床上继续争论”。至于省级党校，也不例外。如闽浙赣省委共产主义学校，学员徐大妹回忆：“学员分三个班，每天听课后就分班讨论。晚上有时也开讨论会，没有灯，燃松光照明。白天讨论时，有时在草坪上，有时在山上。”广泛地、深入地研讨交流，往往使学员从中获得更多的启发。

正是坚持了传授性与启发性统一原则，不仅使学员接受了先进理论的武装，也使他们将自发的革命实践逐渐转变为自觉的革命行动。学员刘俊秀回忆，“几年来搞农会、打土豪、分田地、闹翻身，只是凭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和阶级仇恨与敌人斗，革命道理懂得很少。通过这次在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读书，使我的视野看得更远了，胸怀更开阔了。”

党校红色记忆

平山团与“子弟兵”的由来

□ 傅建芬

河北省平山县位于太行山东麓、滹沱河上游，是石家庄西部的一个山区县，革命圣地西柏坡就坐落在平山县的中部。说到平山县西柏坡，人们都知道“新中国从这里走来”，这个原本极为平凡的小山村已经载入史册，成为平山人乃至河北人的骄傲。平山县还有一个值得骄傲、值得载入史册的团体，这就是平山团。河北女作家程雪莉用5年时间，从红色西柏坡出发，辗转2万里，寻找那个承载国家和民族骄傲的团体——平山团，而后用真诚的情感、真实的笔触，以55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寻找平山团》，记录 and 礼赞了平山团一个个非凡而普通的人民子弟兵，挖掘了平山团可歌可泣、英勇悲壮的往事。这部著作由于“挖掘了崇高、悲壮、英雄、慷慨的伟大民族精神内涵”，而荣获中国报告文学最高奖——“徐迟报告文学奖”。阅读《寻找平山团》，可以让我们详细了解平山团和“子弟兵”的由来。

1930年代初，平山县便燃起了革命的火种。1934年底，平山县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栗再温重返家乡，参与平山县委的领导工作，从此，革命的洪流在平山县汹涌澎湃、不可阻挡。1937年9月，在抗日前线取得平型关大捷的八路军乘胜东进，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9月28日，八路军120师359旅副旅长王震率部来到平山县洪子店，向平

山县委的同志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创建抗日根据地、开展敌后游击战的指示精神，号召平山县的共产党员组织平山人民抗日救国，用生命和热血保卫家乡。时任冀西特委书记栗再温、平山县委书记王昭带领平山县的共产党员，迅速组成了10个扩军小组，分赴各个村镇宣传动员。一时间，平山县沸腾了，“抗日救国，人人有责”“参加八路军，赶走小东洋”，抗战的口号响彻太行，抗战的标语刷满街巷，抗战的歌声激越嘹亮……

参加八路军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随时可能为国捐躯，因此，富于牺牲精神的平山共产党员带头参军。平山县委委员梁雨晴动员家乡的党员集体入伍，仅有60多户人家的猫石村一下子走出了34名八路军战士，梁雨晴担任八路军平山团第一营第一连第一排排长。平山县第一位农民党员、第一位农村党支部书记李法庄，率领霍宾台村60多名青壮年赶赴洪子店集体参军。父子相随入伍、兄弟结伴参军、师生一同从戎的感人场面，出现在平山的山村、乡镇。短短1个月零3天，从12岁到50多岁的平山子弟，陆续继续加入抗日队伍，组成了兵员1700人的平山团。11月7日，在一片激动人心的锣鼓声中，平山团离开洪子店，跟随120师359旅开赴抗日前线。1938年1月，罗荣桓率领115师教导队来到洪子店，希望栗再温帮

助扩充兵员，参军的热潮再度涌动，平山县又有1700名子弟跟随115师挺进鲁东南，成为115师的平山团。据统计，抗战期间，仅有25万人口的平山县陆续输送12065名英雄儿女参加八路军。

开赴抗日前线的平山团英勇善战，立下了赫赫战功。1938年3月11日，718团2营与717团在崞岚县三井镇围歼日军第26师团千田大队，毙伤日军300余人，俘虏日军28人；6月10日，718团2营、3营在浑源县南晋家庄战斗中，将日军300多人困在一条狭长地带，集中火力猛烈打击，毙伤日军100余人；9月24日至30日，718团团长沙宗尧率1营、3营阻击进攻灵丘的日军，占领有利地形，利用夜战灵活性，步步紧逼，竟然逼得日军100人跳崖……1938年11月，718团参谋长左齐在伏击日军运输大队的战斗中左臂受伤，白求恩大夫连夜为他做右肩关节离断手术，保住了他的生命。当白求恩得知这些小伙子都来自平山时感到十分惊讶，高兴地与他们攀谈，告诉战士们他刚刚从平山来，并用生硬的汉语发音说出“平山”两个字，战士们都笑了。白求恩对清一色平山子弟组成的平山团感情很深，在日记和信件中亲切地称他们是“朴实可爱的孩子”“穿着军装的劳动人民”，“他们平均年龄是二十二岁……通常是些大个子，六尺高，强壮而黝黑，一举一动又沉着，又有明确的目的性，有一种果敢的风度。为他们服务，确实是一种幸福……”经过白求恩大夫的精心治疗，平山团71名伤员重返抗日前线。

1939年5月，717团在日军“扫荡”中被包抄，718团紧急驰援。在战斗中对日军形成反包围，展开近距离肉搏战。这次战斗激战7天7夜，共毙伤日军1000余人，其中击毙敌人600多人，俘虏敌人11人，仅3营战士王家川一人就杀死了8个日寇。此外，还缴获九二式步兵炮2门、迫击炮3门，轻重机枪22挺、步马枪800多支，战马200多匹。这一战打出了平山团的威风 and 英名，捷报传来，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



于5月20日通令嘉奖平山团，授予平山团“太行山上铁的子弟兵”光荣称号，指出：平山团的全体指战员们，特别发扬了我八路军的光荣传统，不顾一切牺牲，最坚决地把深入的敌人歼灭在山地里，这是平山团全体指战员同志最光荣的胜利纪录。……你们是平山子弟的优秀武装，边区子弟的优秀武装，你们是太行山上铁的子弟兵！这是“子弟兵”一词首次用于称呼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5月28日，《抗敌报》全文转发聂荣臻司令的嘉奖令，“平山团”“子弟兵”这两个词语不胫而走，传遍华北大地。

为什么“子弟兵”这个称呼很快就能家喻户晓？因为它深受人民群众和人民军队指战员的喜爱，因为它饱含着人民军队和老百姓之间同呼吸、共命运的鱼水深情，因为它深刻地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来源于人民、根植于人民的新型军民关系。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先生1940年春到晋察冀考察后，撰写了《华北敌后——晋察冀》一书，他在书中称颂道：子弟兵是老百姓的儿子，是在晋察冀生了根的抗日军。此后，“人民子弟兵”作为抗日军民对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的亲切称谓，传遍全国，并沿用至今。



九月
丹桂飘香
初识的我们
聆听总书记教导
热烈的氛围里
我和你
交流
互动
时间的纹理
已将我们的身影
刻进同一个殿堂

十月
七十年诞
银龄岁月闪烁的光影
跳跃在我们身上
街色匆匆
探索的魅力吸引着我们
我和你
绽放
起航
心中明了
新时代的曙光
奋斗是飞翔的翅膀

十一月
初冬时节
我们的信心满满
号角吹响
激情澎湃着
我和你
思想
心潮
中国之治
大江大河奔向前
时代潮流不可挡

十二月
岁末深冬
严寒难挡热风的深望
学思践悟教学相长
喜悦爬上了
我和你

我和
你

□ 杨逸铮

肩头
心上
来激励同学
担当我们的担当
实现共同的梦想

而今
时光飞逝
不觉已到期末
在党性锻炼的熔炉里品味
新年特有的芬芳
我和你
挥手
辞旧
2020年
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天道酬勤换来日新月异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员】



平山农村青年踊跃参加八路军